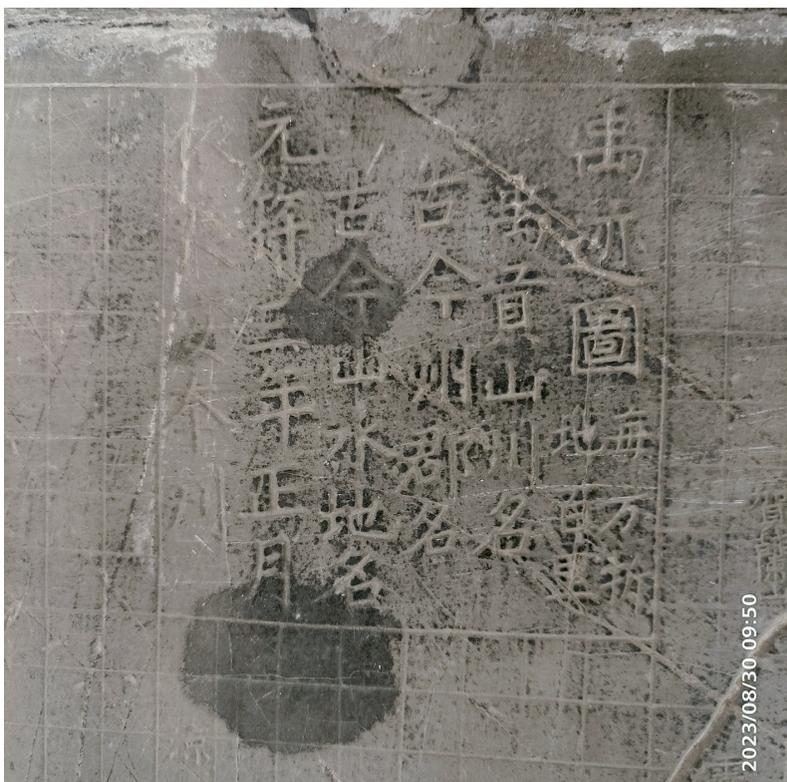


宋代制图学家的杰作——《禹迹图》



□ 马彦如 张剑

地图是人类认识世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，早在象形文字出现以前人类就有了“地图”。《禹迹图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，也是我国地图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，在古代科技史上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及突出的历史地位。

“禹迹”意为大禹走过的地方，相传夏禹治水，足迹遍及九州，后因此称中国的疆域为禹迹。据考证，现存的《禹迹图》有两方：一方保存在陕西西安碑林，为刘豫伪齐政权阜昌七年（1136年）刻石；另一方收藏于镇江博物馆，为南宋绍兴十二年（1142年）刻石。两方石刻大小相似，内容基本相同。

镇江博物馆收藏的这方《禹迹图》石刻呈方形，青色石灰岩石质，长、宽各约100厘米，不仅是当时科学水平很高的一幅山水地图，还是一幅严谨独特的行政区划地图。

《禹迹图》刻石一面刊图，一面素面。图首方框内竖刻六行：“禹迹图，每方折地百里，禹贡山川名，古今州郡名，古今山水地名。元符三年正月依长安本刊。”图的左下角长方形框内竖刻三行：“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左迪功郎充镇江府学教授俞篔簹重校立石，冯遂镌。”

在《咸淳临安志》卷61“国朝进士表”（下）中载有一位叫“俞篔簹”的信息，为宋高宗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壬子科进士，杭州人，可能与重校立石的俞篔簹为同一人。冯遂是刻工的名字。左下角竖刻款题旁另有明代加刻的小字两行：“天启六年春掘地得此八宝，王好察识”，表明《禹迹图》曾遗落土中，到明代时又被人发现。

《禹迹图》采用我国古代传统的“计里画方”制图法，并最早使用方格坐标为底绘图。整个图面上浅刻横

竖直线交叉组成的相等方格，就像现代地图的经纬网一样，方格边长约1.1厘米，上下73格，左右71格，共计5183格。图面方向为上北下南，比例尺约1:4200000，记录的实际范围辽阔：东至黄海岸边，南达海南岛，西至青海祁连山，北到黄河北沿。

图内以符号和文字相配合，主要刻有宋代的山水及州（军）的形势和位置。全图共有地理名称500多个，既反映了古代九州的概貌，又描绘出宋朝时期中国的地貌全景。对我国各主要水系如黄河水系、海河水系、济淮水系、长江水系、岭南水系等均有相当客观和完整的反映，海岸线描绘也非常准确，特别是山东半岛部分已经十分类似近代地图表现的形象。该图还提供了北宋元祐初年发展变化的行政军中“大军”的格局，对于研究宋代行政区划史亦是一个重要的资料。

著名学者葛兆光将《禹迹图》看成古代中国的“世界地图”，认为制图者把汉族所在的空间放在中央，且占据了“天下”的大半，将异域画得很小，放在四周，表达了古代中国关于天朝与四夷的想法，表现了古代中国长期延续的“天朝中国”的观念和朝贡体制的想象。

关于《禹迹图》的作者，史籍未有明确记载，目前主要有“乐史说”“贾耽说”“游师雄说”“沈括说”等几种观点。至于成图年代，更是众说纷纭，一直存在争论。英国汉学研究者苏慧廉和李约瑟将《禹迹图》的绘制时间定于1100年前，但未确定该图的上限。此外还有“元丰四年（1081年）至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”“元祐二年（1087年）至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”等说法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西安《禹迹图》原置于凤翔府岐山县的县学中，镇江《禹迹图》原置于镇江寿邱山下的镇江府学文庙大成殿（今江苏大学梦溪校区内），两方《禹迹图》同样上石并立于学校，据专家判断应是用于教学的目的，与当时政府在各级学校提倡和传播地理知识有关。

只有1平方米的《禹迹图》暗藏乾坤，考察中国地图学发展史，不能不提到《禹迹图》。李约瑟在其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》中，称此图是“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，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”，他说：“无论是谁把这幅地图拿来和同时代的欧洲宗教寰宇图比较一下，都会因中国地理当时大大超过西方制图学而感到惊讶”。

问道茅山三千年^{③〇}

□ 张春蕾 夏和生

(六)司马承祯 (647—735年)

唐代著名高道，字子微，法号道隐，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，河内温（今河南温县）人。家里世代为官，但与家族中其他人热衷仕宦相比，司马承祯是一个异类。他从少年起就十分好学，崇尚道法，淡泊名利，无心仕途。到了21岁，他前往中岳嵩山，拜茅山宗师潘师正为师。

潘师正对司马承祯的器重和期待有加，将自己的道法倾囊相授，传三洞秘录、金根上经、符箓及辟谷、导引、服饵之术，司马承祯道法日趋精进。

学道有成的司马承祯，走遍天下名山，最终选定天台山玉霄峰为隐居修行之地，自号“天台白云子”。

他本想潜心修道，斩断红尘，但却不能如愿。

唐睿宗鉴于父亲高宗屡次请潘师正出山传道均遭婉拒的教训，采取了一个令司马承祯无法拒绝的办法，让司马承祯的哥哥做使者，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：“本来想派使者专门去迎请您，又担心您感到惊惧。因此请令兄前往，请您不要拒绝，一同到京。”

司马承祯为了家族安危与前程，只得勉强从命，下山进了京城。唐睿宗见到他兴奋异常，自称弟子，尊司马承祯为国师，向他请教阴阳术数和治国大事。

司马承祯回答说，阴阳术数是异端，治国应该按《道德经》上说的，“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”。睿宗深以为然，他本想把司马承祯留在身边，日夜请教，但司马承祯执意请求还山。

司马承祯有一位好友名叫卢藏用，听说他要回天台山，赶紧劝他说：“天台山太远了，要不你到终南山修行吧？这座山中好地方也很多！”卢藏用科举没考上，于是便跑到终南山做起了假隐士，以博取名声，后来果然被召到朝廷做官。

司马承祯看穿了他的心事，回答说：“是这座山中有做官的捷径吧？”卢藏用十分羞惭。“终南捷径”这条成语便由此而来。

看到司马承祯退隐意志坚定，唐睿宗没法，只得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玄宗继位后，对司马承祯依然十分器重。开元

九年（721年），玄宗派遣使者迎司马承祯入宫，亲受他传的法箓，并称呼司马承祯为“道兄”，成了不折不扣的道士皇帝。

玄宗还采用《道德经》的精神来修身治国。开元十五年（727年），又召司马承祯入宫，请他在王屋山自选佳地，建造阳台观以供居住。

司马承祯上书玄宗说，今五岳之神祠，皆是山林之神，非正直之神。五岳皆有洞府，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，请别立斋祠。玄宗听了他的话，在五岳各建真君祠一所。

司马承祯成为两朝帝师，深受朝野景仰，宰相张说、张九龄等纷纷拜他为师，就连自号“谪仙”的李白在他面前也毕恭毕敬，将他比作昆仑山上巨大无比的稀有神鸟，自称自己是一只大鹏，希望得到他的帮助。上清派茅山宗因他的缘故，影响力达到空前的程度。

开元二十三年（735年）一月十八日，他突然对弟子们说：“今天被东海青童君、东华君召请，必须离开人间。”于是仙化而去，享年八十九岁。去世后谥号贞一先生，弟子七十余人，以李含光最为著名。茅山上清派尊他为第十二代宗师。

司马承祯是一位全能型的高道。

他是一位功力颇深的诗人，与陈子昂、卢藏用、宋之问、王适、毕构、李白、孟浩然、王维、贺知章为“仙宗十友”。他曾写下一首《答宋之问》诗，“时既暮兮节欲春，山林寂兮怀幽人。”在社会上流传很广。

他擅长音律，创作道乐《玄真道曲》。

他又是书法大家，特别擅长篆书和隶书。曾手书三种字体的《道德经》，很受皇帝的喜欢。时人称他写的字为“金剪刀书”。

司马承祯还是“大国工匠”，他亲自铸造出精美的铜镜和宝剑，奉送给唐睿宗和唐玄宗，倍受两代帝王的称赞。

作为上清派宗师，司马承祯在道学方面的著述十分丰富，《坐忘论》《服气精义论》和《天隐子》为其代表作，也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资料。

他将隋唐道教的重玄哲学思想与上清派存神服气的养生仙术相结合，阐明兼修心神和形气的修持方法。在其代表作《坐忘论》中，他提出了修道的“七阶次”（分别为信敬、断缘、收心、简事、真观、泰定、得道）、“五渐门”（分别为斋戒、安处、存想、坐忘、神解）之说，概括起来说，就是要道教徒心静、无欲、物我两忘，这种清心无欲的修道理论，对后世道教修炼理论的发展和北宋理学的形成，皆有一定影响。

本版图片为资料图

